

陈业新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儒家生态意识 ⑤ 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 环境保护研究

陈业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摘 要

本书以儒家生态意识为对象,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传统环境意识和历史时期的生态保护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儒家生态意识、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两方面内容。儒家生态意识则由其发生的哲学基础(“天人合一”论)、生态学知识基础(生态系统论)、儒家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资源的主张、《周易》“三驱”礼的生态保护意义等内容构成;环保实践的考察,主要以先秦、秦汉时期为对象,在勾勒其基本生态状况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国家制度层面,如生态法律、生态职官等具体内容的研究,展现儒家生态意识在古代生态保护方面的作用,进而显明儒学于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构建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 / 陈业新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科学人文丛书)
ISBN 978-7-313-07987-9

I. ①儒… II. ①陈… III. ①儒家—生态学—研究②
环境保护—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222.05②X-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0110 号

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

陈业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30.5 字数: 525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987-9/B 定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5)
本研究得到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研究基金(2004) 资助
孔子文化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2001)

特此致谢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天人合一”论：儒家生态意识的哲学基础	013
一、近些年来关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研究述评——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对象	013
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论略——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对象	038
三、结语	068
第二章 生态系统论：儒家生态意识发生的生态学基础	070
一、生物“类”的认识及其生态保护意义	071
二、关于生态系统内生物生存环境的认识——生境论	083
三、关于生态系统内生物间关系的认识	097
四、九州的划分——儒家生态系统观的具体反映	104
第三章 “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儒家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主张	110
一、“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儒家合理利用和保护山林资源的主张	111
二、“鸢鸢于飞，毕之罗之”——儒家合理利用和保护动物资源的思想	126
三、结语	165
第四章 《周易》“三驱”考释——兼论“三驱”礼仪的生态保护意义	167
一、问题的提出	167
二、“三驱”考释	170

三、“成礼三驱”：战国至汉唐时期蒐狩礼与“三驱”礼的性质变化 / 197	
四、“申三驱于大信”——儒家对“王用三驱”大义的申说 / 215	
五、结语 / 229	
第五章 战国秦汉时期的气候状况研究	233
一、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 / 233	
二、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状况研究 / 262	
第六章 秦汉政府行为与生态	280
一、秦汉政区划分与生态 / 280	
二、秦汉人口政策与生态 / 284	
三、移民实边、屯垦政策与生态 / 293	
第七章 生态职官考述——以先秦、秦汉时期为对象	341
一、先秦生态职官考述——以《周礼》为对象 / 341	
二、秦汉时期生态职官考述 / 372	
第八章 秦汉生态思想与生态保护法律	382
一、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 / 382	
二、秦汉时期生态保护法律 / 397	
余论	419
附录：儒家生态意识特征论略	445
主要参考文献	463
后记	479

图表目录

图 4-1 《周礼》中冬“教大阅”“三驱”示意图	186
图 4-2 《大唐开元礼·军礼》“皇帝讲武”示意图	214
图 5-1 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主要钻孔所在地示意图	265
图 6-1 秦汉时期全国人口数量变动示意图	287
图 6-2 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汉代遗迹分布示意图	324
图 1 中国历史时期森林覆盖率及水旱灾、洞庭湖区洪涝灾年均发生率示意图	427
图 2 历史时期各朝人口、耕地最高数额、人均耕地亩数和年均毁林面积示意图	430
表 2-1 《尚书·禹贡》九州大生态系统	105
表 3-1 《礼记·月令》记载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资源情况	112
表 4-1 《周礼·大司马》四季蒐狩礼	183
表 5-1 两汉时期某些农作物农事活动时节早晚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对照	251
表 5-2 两汉时期雪灾发生时间	255
表 5-3 两汉时期干湿状况统计	258
表 5-4 长江中游地区三种植被类型的气候指标	266

表 6-1	西汉初期部分侯国户数增长情况	287
表 6-2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 年)、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 年)人口分布 状况	289
表 6-3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 年)、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 年)西北诸郡人 口数及人口密度	309
表 6-4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 年)、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 年)南方部分地 区人口数	310
表 6-5	两汉时期河套一带 5 郡辖县及其户、口情况	319
表 6-6	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汉墓出土明器情况	333
表 6-7	内蒙古地区鸮类生活环境及分布情况	336
表 7-1	《周礼》六卿官属(总属)	346
表 7-2	《周礼·地官司徒》所载虞衡编制	352
表 7-3	《周礼·职方氏》所载九州“大生态系统”	356
表 1	中国历史主要时期薪柴、棺木消费林木量及毁林面积情况	433

前言

一、本书写作的缘起

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休戚相关。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必要的空间、场所条件,离开具体的生态环境,人类就无法生存,遑论所谓的创造文明。而且,自然环境又直接制约着人类的发展。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前进步伐,都留有浓郁的环境烙印,自然环境某些要素的变化,甚者可直接导致人类文明的变迁(如河姆渡文化等)乃至毁灭(如两河流域文明等)。同时,人类文明对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人类日益增强的所谓“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作用下,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并朝着人类期望的方向或目标发展^①。但人类的某些不当举措(如过度地拓荒和片面地发展工业等),在一定程度上可破坏自然环境或加剧其恶化程度。

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文明的形态来划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采集狩猎阶段,人类顺应自然。②农业文明阶段,人类改变自然。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行为^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③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矛盾突出^③。然而,纵观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关系发展史,不难发现:自然环境并非像人类想象或期盼的那样,完全地按照人类的意愿

① 恩格斯曾以德国为例,对此进行了阐述:“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9页)。

② 例如,人类有意选择种植某些或某种作物,排除其他植被的生长(如垦辟农田时的毁林、田间管理时的除去与作物一起生长的杂草等),以及为满足发展农业生产之需而广泛兴修水利工程等等。

③ 李亦园:《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孙振玉:《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或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生变化;并且,人类往往还要为自己非理性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自然常常以其特有的方式抵制人类的改造,甚至对欲壑难填的人类进行报复。对此,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①因而,恩格斯反复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

恩格斯的论断,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警示。但是,这一警告长期不被世人关注,人们片面地满足并陶醉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及其带来的种种物质成果。于是,一方面,工业文明依旧突飞猛进,人们继续享受因其发展而带来的有限福祉;另一方面,工业文明难以挽回的环境后果也日益凸显:森林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与水土流失严重、淡水资源日渐枯竭、生物多样性损失急剧、大气污染与臭氧层破坏空前、酸雨普降、废物垃圾成灾、温室效应和城市噪音污染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锐减^③。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不仅危及当下人类社会的生存,而且严重地掣肘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人类如何才能解决和排纾这些严重的问题和困难呢?

工业文明背景下环境问题的产生,大都由以发达的生产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所致。“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工业畸形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同时,技术是人类的“产儿”。环境问题的出现,根本还是因为人类。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解决人类不当行为导致的环境问题,首先要从社会的层面来解决,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固然必不可少,而环境意识的普及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除生产外,人类个体的日常生活也是诱发环境问题不可忽略的一端。人类环境意识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其生活、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环境的状况。因此,缓解或根治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思想层面的手段即普及环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2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

③ 王玉德:《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现存的十大问题——兼论建立生态文化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任秀芹:《儒家文化中的生态观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启示》,《昆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意识不可或缺。事实上,西方社会在寻觅解决环境问题方案时,在采取其他诸多手段的同时,无不积极地从事于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建设。在构建其生态伦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如美国的唐纳德·沃斯特、罗德里克·纳什、霍尔姆斯·罗尔斯通和法国的阿尔伯特·史怀泽(又译施韦策)等,又常常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中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足资西方学者汲取的思想资源,对建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大有裨益。

在西方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历史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环境史——遂应运而生。有学者因此认为,“从某种角度上说,环境史是时代的产物。”^①与以往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自身情事相比,环境史重点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研究的视角、侧重点和具体内容的变化,学界因而把这一自19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的环境史^②看作“新史学”。1980年代之后,环境史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巨大的潮流,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已经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如200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0届历史科学国际大会”上,以“史学中的人类与自然:经济史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自然灾害及其后果、自然科学、历史与人类”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史,即为该次历史学国际盛会的三大主题之一。

笔者把环境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习领域,绝非“赶潮”使然,而是兴趣所致。早在1990年代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在对史学研究趋势尚不十分明悉的情况下,笔者就把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与灾害等属于后来知道的“环境史”问题,作为自己的研习方向或目标,并完成了题为《两汉地震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此后,笔者参加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玉德教授主持的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研究工作,完成了其中2章约15万字的内容。项目结束时,笔者在中国环境史研究方面积累了不少材料,也有较多的思考和想法,并试图择机再续“前缘”。2001年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后,一个偶然的机,在2001年5月24日的《光明日报》和《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上,笔者看到了孔子文化大学面向全国发布的“‘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指南”。该基金系由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独立设立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专项基金,其目的在于资助、支持儒学研究。此次公开发布的10余个研究项目中,即有一项

① 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②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题为“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课题。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笔者向项目发布单位提交了申请书,并于当年的7月获批立项。此后,笔者又以该项目申报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2005年),并先后得到资助。这样,这一问题的探讨就由“试一试”而变成“不得不”为之的事情了。

二、研究状况的简述

“环境史”兴起于1960年代的美国,但中国学界关于历史时期环境的研究,仅从时间上而言,似乎并不比西方晚,但仍有不少缺憾,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最早一批研究环境史者,基本上来自历史地理学界,其研究主体多限于历史地理学者^①,环境史的研究不具备普遍性,环境史还没有得到历史地理学界以外的其他学者的关注。其二,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虽有很多的重叠,但所异也十分明显。根据有关阐述,环境史是从环境的角度对人类历史进行全景式的综合考察,主要探讨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②。按照这一表述,愚以为今天所讲的环境史,主要可能是就环境史观而言的,即把环境纳入历史考察的视野;而历史地理所讲的环境史,

① 重要者如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所从事的研究,不少与环境史相关。虽然那时国内尚无现在所谓的“生态史”或“环境史”概念或明确的提法,但从其研究成果的内容、方法等要素来看,诸学者从事的研究显然就是后来“环境史”研究所强调的内容。对此,学界也多予明确的承认。如景爱通过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比较,认为早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后来的环境史研究基本一致。指出:历史地理学家是中国最早涉足环境史研究的人,他们为环境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当代著名的环境史研究开创者”(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王利华也著文强调,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玉德进一步指出:“环境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延伸,或者说是从历史地理学走出来的新兴学科。在以往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研究环境史,把环境史当作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王玉德:《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此后乃至今天,中国大陆环境史的研究主体,其学科背景和专业训练,也基本上以历史地理学界为主,不仅研究阵容庞大,而且研究范围广,内容丰富。从研究区域而言,重要者如谭其骧、邹逸麟关于黄河和黄淮地区生态的研究,史念海、朱士光关于黄土高原环境的研究,侯仁之的沙漠考古和北京地区的环境研究,石泉关于荆楚环境的研究,陈桥驿的浙江环境研究,韩茂莉的辽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以及诸多学者江南地区环境的研究等等。

② 梅雪芹:《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重点是指环境变迁史,当然也包括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①。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大概始于1980年代。近30年来,在国际环境史研究大潮^②和国内历史地理学界研究兴勃之势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迅猛,不仅发表或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专门著作^③,而且还先后多次召开了专题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定数量的论文集^④,呈现出欣欣向

- ① 另一方面,中西方环境史研究的重点,因历史久远程度不同,从时间段来看,各自研究的侧重也有所不同:西方环境史重点研究工业文明以来的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而以历史地理学研究为主的中国环境史,虽然也考察近现代以来的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但更以此前的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并且,由于历史时间的长短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连续性和详略程度的不同,还使得中外在环境史研究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中国学者主要借用丰富的文献,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进而探讨中国历史文化;西方学者除在近现代环境研究上有所贡献外,还在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面建树颇多,但从相关的介绍和评述看,其理论建设的历史远没有中国实证性研究的历史长远。
- ② 在翻译、评介海外环境史研究成果,以及环境史研究基本理论探讨等方面,刘翠溶、李根蟠、侯文蕙、梅雪芹、王利华、包茂宏、高国荣、曾华壁等功不可没。其重要成果分别如《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论环境史研究的起源、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23卷,1996年6月)等,对推动中国环境史的繁荣,贡献不小。
- ③ 史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状况,王子今等人的有关论著有具体的述评。具体参见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钞晓鸿《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版)、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陈建明《探寻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视野——“对大地的影响:中国近期环境史”国际研讨会综述》(《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汪志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另外,《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特辟“中国环境史研究”专题笔谈,发表了朱士光、王利华、邹逸麟、蓝勇、王先明、钞晓鸿等撰写的几篇笔谈(分别为《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几点认识》、《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文献与环境史研究》),其中也多少涉及一些环境史研究成果。尽管相关述评的列述各有侧重,所列成果或仅为某一阶段中国环境史研究既有论著的一部分,但将上述述评加以综合,我们说,它们基本囊括了有关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全部成果。
- ④ 以下有关中国环境史的研讨会值得关注:1993年12月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香港,会后出版有《积渐所致: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刘翠溶等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2002年1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主办的“环境史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04年1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地域研究企划交流中心主办的“对大地的影响:中国近期环境史”国际研讨会(日本京都);2004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转下页)

荣的景象,颇有成为“显学”的态势。

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可分“内史”、“外史”两大方面^①。环境史“内史”的研究内容,主要为环境的“自然”史,即环境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属于由气候、生物、水等自然资源或环境要素构成的环境基本状况层面的分析、研究。“外史”则为研究环境与人类社会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外史”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一为技术、制度层面的分析研究,具体为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以环境变迁原因、环境保护举措和灾害为研究主要内容;二是理念层面的探讨,主要为人对自然的认识,即环境意识或生态意识方面的研究。自从有了人类干预,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的印记遍及环境的各个角落。因此,从环境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纯而又纯的环境“内史”似乎不再存在;如果有的话,也是相对而言的。所以,环境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外史的角度而论的。综观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截至目前,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环境要素变迁及其原因探讨等方面^②,而在生态意识、环境保护等内容方面,尚着力

(接上页)“西部历史环境与文明的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乌鲁木齐,会后出版了题为《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的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2005年8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天津,会后出版了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的论文集,王利华主编,三联书店2007年版);2005年11月武汉大学主办的“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论会(武汉);200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清代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宁);2006年1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主办的“环境史研究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会后出版了题为《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的视角》的论文集,刘翠溶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版)。

① 这里的“内史”、“外史”概念,主要借之于科学史界。科学史研究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有“内史”、“外史”之分。按照江晓原的界定,“内史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如席泽宗等《中国天文学史》和陈遵舫的《中国天文学史》等即为此类著作;而“外史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江晓原的《天学真原》就是一部从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著作。具体参见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 如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一文所列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包括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环境史的综合研究,以及理论、方法和今后研究的方向等三个方面,其中关于气候、海陆、植被、野生动物、水文,以及灾害、沙漠与沙漠化等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研究成果的列述,占全文篇幅的2/3以上。又如钞晓鸿文《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一文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概述,共分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自然灾害及疾病史,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以及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等八个部分,其中关于气候、动植物与沙漠化、灾害和疾病史等环境要素变迁成果的述评内容,亦超过全文篇幅之半。表明国内环境史研究以环境要素变迁的考察为多。

不够。

目前,学界有关生态意识的研究成果,著作方面涉猎的,主要有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王玉德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册)等等^①。论文方面,专论者主要有邹逸麟的《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胡同庆的《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赵珍的《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保护意识和措施》、王社教的《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邝龔子的《从〈诗经〉及唐前歌谣看民间的自然意识》^②等等。少见的研究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意识内容极不对等。

环境保护研究的成果,著作方面,除上列罗桂环、王玉德等著述外,主要还有罗桂环等《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研究》、李丙寅《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③等著对历史时期的环保也多有论及。论文数量则相对较多,涉及先秦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态保护^④。但总的说来,环境保护的研究,并非学界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从该类成果在上列张国旺、钞晓鸿等综述文章中所占篇幅比例大小即可知其一二,尤其是从制度、法律层面研究历史环境保护的成果,目前更是不多见。

总之,就目前而论,史学界关于环境史的研究喜忧参半,一方面,新人新作迭出,研究阵容庞大,成果丰富,发展势头可喜;另一方面,问题也较明显,目前的环境史研究,就像一辆时髦的公交车,任何人都可随时涉足,不论是否具有相应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因此,表面热闹的环境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许问题。

①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林甘泉:《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另见邹逸麟《榕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敦煌研究》2001 年第 2 期;朱诚如等:《明清论丛》第 4 辑,紫禁城出版社 2003 年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年第 1 辑;刘翠溶:《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的视角》,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 2008 年版。

③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5 年版、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④ 主要者如郭仁成的《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 年第 5 期),倪根金的《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李丙寅的《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 年第 1 期)、《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 年第 1 期),刘华的《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张全明的《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 年第 6 期)、《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 年第 1 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5 期),杨昶的《明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5 期)等等。

典型者,愚以为有三:一是研究成果重复现象严重;二是研究成果质量不高者颇多,具有创见性的论著更是少见;三是一些研究领域无人涉足,尤其是传统生态意识和保护举措方面,更是罕人问津。

不过,与史学界对历史时期的环境意识研究不够相比,国内哲学界从环境伦理、生态哲学的角度,对传统社会诸如“天人合一”论等思想有较多的探讨^①。研究论文主要散见于诸如《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学术期刊上和相关论文集^②。此外,还出版了不少的论著^③。2002年,《中国哲学史》杂志第2期刊发了杜维明的《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蒙培元的《孔子天人之际的生态意义》等文,在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此为契机,《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组织的主题为“儒学与生态”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夏在京举行。任继愈、汤一介、杜维明、蒙培元、张立文、余谋昌等一批学者出席了此次讨论会,对儒家生态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儒学网”^④和《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刊布了讨论会的部分内容,对加强和深化儒家生态意识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海外学界对东方生态智慧也高度关注。叔本华、史怀泽、赫胥黎、汤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认为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 and 解决当代环境危机必须从中国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如美国环境学家罗尔斯顿认为,吸取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部分地提高西方人的伦理水平,改变直到现在西方还存在的那种仅仅把动植物(“地球上的那些非人的邻居”)当作“拧在太空飞船地球上”的铆钉,而不是当作“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的错误观点^⑤;德国汉学家卜松山对

① 本书第一章第4部分内容,对此有专门的述评。

② 论文集主要者如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何光沪等《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现代性探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③ 主要者有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余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文衡《易学与生态环境》(中国书店2003年版)、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蒋朝君《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④ <http://www.confuchina.com/zhuanti/index.shengtai.htm>。

⑤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科学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徐兰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室:《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哲学界关于儒家“天人合一”的普遍观点持赞同的态度,认为儒家“天人合一”论既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也是一个“在今日具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的思想。指出:“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或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事实表明,儒家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乃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如今由于西方模式的错误蔓延,人类有必要从现代向后现代思想转变。科技的进步威胁到人类和全球的生存。西方的现代化和短视的增长欲,隐藏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就像电脑病毒那样,也许正在游戏快要结束时才会出现,结果将毁掉全部的内存。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似乎可以弥补西方思想的局限,对于人类应付后现代社会的挑战,也许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实意义”^①;现代日本的环境哲学、环境思想大多以西方哲学或思想为基础而展开讨论的。近些年来,“非西方的思想在这里就没有意义吗”的呼声日高,一些日本学者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智慧,尝试性地从东亚自身传统思想中挖掘对于现代环境思想的意义,诞生了诸如梅原猛等之《东方思想的智慧》等著作。这些著述对儒家的“天人合一”与“普遍和谐”的生态智慧予以了相当的重视,认为儒教虽是自孔孟以来到朱子学、阳明学的各种流派间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但“天人合一”与“普遍和谐”则是各流派中“大致共通的基本思想”^②。另外,为深入探讨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哈佛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杜维明、成中英等出席了这些讨论会,组织者各以《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年)、《儒学与生态》(1998年)、《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年)为题,将讨论文稿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付梓面世,影响颇大。

上述从哲学或生态伦理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所作的研究,与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上述研究,多就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而展开的,特别是对“出世”之道家情有独钟,而对积极“入世”之儒家的生态意识关注得不够,而且对儒家的认识还存在严重的偏颇,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儒家甚至是典型的西方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由此使得专以儒家环境意识为研究

① (德)卜松山:《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和后现代意义》(张国刚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另见季羨林等《东西文化议论集》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日)龟山纯生:《东方思想在现代环境思想中的意义——以佛教思想为中心》(龚颖选译),《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